

「文化研究」從哪裡來：一段思想移動/運動的筆記*

Where is “Cultural Studies” from? – Notes on the Trajectories of Thinking Movements

劉雅芳**

Ya-Fang LIU

一、「知識」誠可貴，「現實」價更高？

我在臺灣1990年代後期受到「文化研究」理論與知識的影響，並在其大學體制建置化過程中，進入其學術研究機構，修讀碩士和博士。不管當前在臺灣「文化研究」如何被定義，被去政治化或是「小心化」，或是被當前學術生產的分配政治有意地利用，我都認為它是一個因為不同的人參與，而有了不同故事與社會現實淵源的知識與思想運動。不論多少學派流去、多少理論被使用、多少個「在地」正在消蝕和建立「文化研究」，但不變的是，它作為**知識與思想運動**回應、介入歷史與現實，並提出問題與批判的動力。在我走進文化研究的學習過程中，促進我多去挖掘與思考問題的，從來不只有修課的課堂，更多的是常在臺北紫藤廬、清大月涵堂舉

投稿日期：2019年9月25日。接受刊登日期：2019年10月25日。

* 本文修改於2018年文化研究年會「文化在民間」的「文化研究二十年：新世代的展望」場次的引言。感謝王智明老師與蔡孟哲的邀請與組織，尤其感謝鄭亘良於現場代為宣讀和姜亞築、陳冉涌、陳佩甄的鼓勵。年會結束後，感謝朋友們對本引言稿的反饋，尤其是同場次的幾位發言人、王淳眉與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師友。作為討論引言，我提出討論的方式比較偏向個人走進（近）「文化研究」的心理感受變化，主要是想描繪我這一代受文化研究影響的人的某些精神狀態，以及這十幾年所歷經的人文社會研究空間氛圍的轉折。但是，要如何回顧與反思過往的十幾年，對我來說是個厚重與糾結的難題，而且還纏繞著自己如何構想未來的苦惱。也許探論的還不夠充分，具體展開上應該加入更多經驗和觀察的描繪，還望有相似困惑或不同看法的參與者、讀者提出問題與繼續推進。本文2018年3月11日初成稿，2019年7月修定於上海寶山。

** 上海大學文學院文化研究系博士後研究員。

電子信箱：migrancy@hotmail.com

辦的「文化批判論壇」、「亞洲華人文化論壇」等文化研究大小講座與研討會。那也是「文化研究」仍生氣盎然，尚未面臨學術評鑑與體制化考核束縛的時候。2001年到2007年是我在交大社文所讀碩士班到報考博士班的階段，當時大家對於「讀文化研究」和在臺灣讀博士班這個選擇，雖然有所擔憂，但多還是抱以熱情的鼓勵與祝福。然而，從2007年到2016年我進入博士班到畢業這幾年，「讀文化研究」逐漸面臨的是同情（即將失業）的眼光與面對現實的忠告。這些不管是善意的、還是現實的話語背後，當然預設了整體社會與文化結構，包括人文社會學科研究領域氛圍的轉變。有段時間，我曾沮喪地以為「讀文化研究」像是跟人有仇似的，因為我在博士班期間聽到認識的學妹在某學期開學之際，因為想學人類學研究方法而到他校修課，在課堂上自我介紹時提到在「讀文化研究」後，被授課教師言語諷刺，並被請出課堂，也在某小型的針對大學生的研究論文討論會上，聽見某學系的年輕老師聽到學生報告用文化研究的取徑進行研究後，評語中非常「專業化」地指出其論文「沒有方法」。也許，這當中也有所謂「文化研究」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做得還不夠好，累積得還不夠多的問題。但令人不勝感慨的是，在我自己讀碩士班期間，我甚少（幾乎沒有）聽到同學或學弟妹，因為想學習更多所上無法提供的研究課程，或因為想進行跨領域的嘗試而到他系、他校旁聽、修課卻被拒絕的狀況。當然我不是說現在已經全部變成這個樣子，但是這種人文社會研究領域原有的藩籬一道道地加深又意味著什麼？我不確定自己能否想得明白。但是心中不免困惑，人文社會的研究與教學，不論你是哪個專業出身或哪個領域訓練出來的，總還是得有著平等待人、尊重差異的反思。但是時間越是往前走，你往往越是發現，這個鑲嵌於學院的或社會的人文思想知識空間越來越窄化，甚至成為排斥差異的分化勢力。當然你也許會說，現在的學生不像以前的那麼認真了，現在的學者與教師面對的現實與生存條件更嚴苛了，但這往往也是最簡單的解釋方式。可是眼前喪失的，的確是學院裡頭的人文與社會知識生產，與社會現實之間相互介入與培力的空間越來越縮小；漸漸地，打造更豐富的整體文化與社會意識的可能，再次讓渡給主導性的政治權力分配以及單調的知識生產效益邏輯。

但是，我也很想說，我並不是平白無故「自己一個人跑到文化研究這裡來的」。對我而言，當時（尤其是在碩士階段到博士班初期）真的是感受到了一種學習新知識的期待，以及自己好像真的能學著做些什麼的熱切，而沒什麼猶豫地跟上腳步。說得簡單一點，當時遇到的老師（不管是1950世代、1960世代、1970世代）、同學，學校內外的學習與討論都共同參與打造與支撐了一個讓年輕人在社會與文化變動中勇敢地想問題、提出想法、提出另類反思與批判方案的「大氣場」。而我與許多同輩的朋友正是受惠於那個時期，以文化研究為界面提出的許多新興的知識方案與直面社會現實的問題意識，包括來自不同研究領域的老師對我的提攜，而踉踉蹌蹌地走到如今。當然，路還是你自己選擇要走的，遲早該付的都得還。可是當有1960世代的老師在我博士畢業面臨找工作的窘境時，某一天有感而發地說「對不起，是我們這一輩努力得不夠」，或是勸慰地說「你可以想想看適不適合學術體制，不行的話不必勉強，換跑道也沒關係」時，老實說，聽到這些話，我只能保持沉默，不知道要反應什麼。但我心裡難免這樣想：不管年齡與所學的差異，「我們」起碼也算風風火火地從同一個時代/知識空間，因為具有類似的關注而相識，甚至互助合作，才走到了今天，於我而言那是多麼激勵生命與鼓舞個體以知識的能量去多「做」些什麼的動力。但他們突如其來的道歉與勸離好像在說，過去那曾經闖過的空間再也不可能留下些什麼了，亦或者像是在說「那是一段失敗」、「那是一處幻境」，我們現在該面對「現實」了。原來，只有「現實」能戰勝現實，而「現實」永遠不會隨著時間被超克？

二、「文化研究」正在走向何方、如何「做」文化研究？這還是「不同的我們」所共同關心的問題嗎？

回想起大三、大四開始在傳播科系的批判理論課程裡知道「英國文化研究」的歷史和「臺灣的文化研究」的發展，¹我認為，「文化研究」的

1 我的大學本科就讀的是公共傳播學系。

歷史一直有著清楚的軌跡：那就是知識分子介入當代社會與文化政治的歷史。我之所以會對文化研究燃起興趣，一方面是感覺到它和傳播學研究不太一樣，因為它會關注日常生活文化，並且將種種大眾（流行）文化文本當作可研究的對象，但是不尋求傳統傳播學的解釋典範。當時也許是對於新知識盲目的熱情（現在認為當時的熱情來自於還沒真的面對社會、在地歷史、研究對象），因緣際會我以甄試的方式考取了交大外文系語言與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組的碩士班。

這個時間點也是文化研究在臺灣建制化的開端。2002年我應該還是外文系文化研究組（現今已經改為文學組）的研究生，同時期交大傳播所開了兩個新組：文化研究組、文化政策組，當時我們三個組的學生時常要一起修同一門課。在交通大學另成立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後，我透過校內轉所辦法「變更」身分成為社文所碩士班學生。

依然記得碩士班期間，和前後幾屆學弟妹聊天時，討論著霍爾的霸權接合理論(articulation)、文化研究的典範、英國文化研究在做什麼、臺灣文化研究又是什麼這些問題，現在回想，已經不記得那些細節與爭論的內容了，但是那好奇、興奮、快樂的氣氛（也許是因為還太年輕吧）至今印象猶新。我們常常一群學生一起搭車到臺北參加文化研究學會的文化批判論壇和每年的文化研究年會，也一起或個別逛書店分享告知有關文化研究與社會研究的新書（包括蒐集《島嶼邊緣》）。現在回想，當時讀文化研究的學生之間是非常熱衷於討論課堂內外學得的知識、自己尋找的知識、研究與「文化研究」的關連，而不急著鑽研、專找到某一種理論的解釋，也不太懼怕、不太信奉「專業學術研究式」的書寫方式。

在碩二與碩三之際，我開始到清華大學人社院的亞太／文化研究室陳光興老師開設在「外文系」研究所的課程：「文化與消費」、「亞太文化研究」，其大部分閱讀的是亞洲都市研究與消費社會研究的文章，和收錄於《亞際文化研究》(*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期刊上關於批判「美國主義」(Americanism)的文章，之後也開始閱讀溝口雄三(1932-2010)、孫歌等思考亞洲與當代中國歷史狀態的論著。這段歷程也是我跟文

化研究的連結從參考英美研究資源，座落臺灣，轉向參照亞際文化研究的時刻。一直到碩士班畢業，我並不覺得自己離「文化研究」遠，我遭遇的是文化研究在臺灣與亞際意識形成和深化的軌跡。簡短來說，這一個階段的我，開始將對文化研究初始的好奇和英國文化研究的連繫，緊抓住「脈絡化」與「問題意識」為要素，接上臺灣的文化研究、亞際文化研究，以及寫碩士論文那幾年碰觸到的亞洲（東亞）思想資源。

「文化研究」在臺灣是什麼，以及文化研究在我所就學的研究所到底是什麼？在我碩士班後期到博士班初期，這些問題，在所上關於課程調整或因應評鑑所做的討論會上，老師與學生都爭論過。但老師們常常的回答就是：定義文化研究本身就是一個弔詭的問題，因為文化研究有「去學科」（跨領域）的精神，文化研究（可以）各自定義。以我的理解，我覺得所上老師是在說「文化研究」跟英國文化研究有沒有關係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社文所要做什麼「文化研究」以及「把什麼當文化研究」。這個很「多元地」定義文化研究的方式，好像沒什麼不對，而且學術研究空間應該是要自由、獨立的。但是在這自由定義的討論下，我所感受到的是「歐陸哲學」不斷地加入，與此同時社文所是「法國哲學研究所」、「歐陸哲學研究所」的綽號不絕於耳；「到社文所一定要讀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好像也不是假新聞。這時所上「政治、美學、倫理」的課題已經強過我所認知的「文化研究」。這只是臺灣人文社會研究學界的某一個縮影。追求新的知識，重新定義批判與研究的取向，也是研究者的任務吧。

但我要說的是，在這個過程中，整個學習氛圍也轉變了。我所感覺到的是「政治、美學、倫理」的課題下，學生還是認真的，只不過學生們比以前更在意於理論的使用與研究的提問「有沒有學術的價值、理論的價值」，當時學生們已經不覺得提問問題意識需不需要有什麼「文化研究的質地」。也許一方面是，我們就是在「文化研究所」，做的研究當然就是文化研究啊！但不能否認的是，也有許多研究生是因為對於歐陸哲學的興趣而選擇到社文所就讀。只是在這整體的學習氛圍中，我越來越感受到「學術要求、不快樂、孤立、無法合作」的氛圍。對比於我前面提到讀碩士班時的氣氛，差距很大。

我至今還是不太明白這種「沉悶」是不是一定和「理論、學術」要求的機制有關，或和學生的動力有關，或是和閱讀歐陸哲學有關。但是當我聽到某屆畢業生告訴我，「社會結構就和布爾迪厄說的一樣，是條件構成的、是權力運作的場域，個人越來越無法啟動改變，因此布爾迪厄說的都是對的」時，我卻感到震驚。或許他和布爾迪厄說的都沒錯，但是我以為讀「文化研究」的目的是不至受限於現實和社會結構給定的死寂的解釋，而是總能在結構或意識型態的解讀中再形成些新的可能、介入的可能，而不是將世界的狀態說死了，或是因為學得了「理論」而看透世道般，甚或因而造就「看不起自己的過程」。陳光興老師曾經提醒過我，不要當快樂的傻子，也就是說讀書如果「太快樂」恐怕是有問題的。但是我卻以為把文化研究搞得這麼沉悶、學習氣氛變得如此絕望，一定有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我也觀察到原本一些有著樸素的公共意識、集體意識的學生、願意主動做些什麼事的學生選擇退場、孤立地進行自己的研究；應該是說，有些人「不得不」變得「沒有肩膀」（不想主動承擔些什麼），因為即便曾經想過要做些什麼，整體環境中的學習和研究氛圍給予的鼓勵和支撐，都是很表面的。

我這麼想過，文化研究（學會）曾經作為一個（跨）世代知識群體之間的連帶也和社文所歷經一段相似的過程，我看著的是曾抱著一腔熱血認真於文化研究「做事」的人，慢慢地隱退，或選擇站到更邊緣的位置。

三、文化研究的「第三世界」精神底蘊：平等相待和互為主體

回想起2014年在霍爾(Stuart Hall, 1932-2014)過世之際，社文所舉辦的「Stuart Hall與他走過的大時代」紀錄片播映暨座談會上，陳光興老師提到霍爾作為文化研究先行者的特質：「自我反叛」、「平等待人的基本原則」、「真誠」、「把理論當成方法」。當時的我正處於對「文化研究」的各種不滿中，但那場活動卻讓我重新觸摸到「文化研究」觸動我時的溫度，那也是我初遇文化研究的時代中，那些帶給我新知識和新視野的人、他們提出的研究、問題意識帶給我的感受。我願意相信博士班階段更深入接觸的亞際文化研究、第三世界／亞洲思想資源是轉化了「文化研究

在臺灣」的錯綜軌跡，因此我能提取某些不安與動力重新「再想」於文化研究能再做些什麼。真誠／誠實地面對自己所遭逢的問題與困境是很困難的，尤其是要學著「不能只看到個人」，但是我認為這是「文化研究作為一種方法」在面對現實世界與歷史時，具有**進步動力**的所在，即使那伴隨著許多的不安和痛苦。

我也還記得，2016年7月我在博士論文答辯時，曾經對著口試老師們發表了如下的困惑與感觸。我的博士論文研究對象是李雙澤(1949-1977)、楊祖珺、黑名單工作室的王明輝，他們都站在「知識分子」批判自省的位置上，但是他們重疊了歌手、畫家、音樂生產與製作者、作家、學者、行動者等不同面貌；而且他們的心裡都不只看著一個社會，而通常是疊起了好幾個不同的世界與社會視角，並藉之回看「不只是」臺灣的臺灣。²由此反觀身處於學術體制仍自詡為知識分子的學者，其智識的生產作為「實踐」能夠介入的場域確實太單一了，因此往往對社會與歷史的批判與解釋越來越沒有力道。「參照」這幾位文化運動先驅的實踐軌跡，常常使我覺得學院派知識分子們太強調自己的理論或思想命題，太強調自己的知識「言說」，總是要想了才去做或推論。做了才想不可以嗎？以及當你做的事，你的創作（研究），你的思考關注的不只是你個人，你在意的並不是只有自己的時候，到底所謂的思想或批判有什麼好大聲的？我不是覺得不對，而是質疑。因為有時那種大聲，是聽不見其他人怎麼困難地在鬥爭、在生活。這也是透過我的研究對象的精神世界而遭逢的文化實踐軌跡，以及透過他們知道更多投身於各樣文化、社會運動的「無名分子」（相對於赫赫有名的學術理論大家）之後，我才獲得的反思。我一直警覺，也抗拒一種研究者必然就等於知識分子，就必須要站在批判的位置的心態。進行批判，甚而嘗試提出改良式文化實踐方案的前提，我認為，至少需要經過試著感同身受理解的階段，而這包含了批判自己的過程。

2 在此舉一個李雙澤的經歷作為例子，他在1977年遊歷菲律賓且到處做訪問調查時，某一次與一位菲律賓大學生進行談話時，菲律賓大學生問了他為什麼要了解菲律賓，李雙澤回答：「為什麼不？菲律賓是亞洲的一部分，對一個亞洲人來說……」而閱讀李雙澤所留下的關於菲律賓的「現地」調查文字，會發現他所踏尋的蹤跡有大部分是美國、日本殖民菲律賓與亞洲的歷史。

2017年，我帶著不知道下一步該走向哪裡的心情，申請到上海大學做博士後研究員。作為臺灣人文社會博士畢業即失業浪潮中的一員，嘗試「西進」似乎是不得不做的考慮，能不能適應這裡的學術生態、體制與文化是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我想必是很惶恐的。我更沒想過，我的出道講台會是在這裡。在某一次代替同事上一門開給該校文學院本科生高年級的「文化研究選讀」課程中，我帶著學生讀了一篇李雙澤寫於1970年代反思當時臺灣年輕人「為什麼不唱自己的歌」的文章〈歌從哪裡來？〉(1976)。我當時有點膽戰心驚地介紹了1970年代臺灣社會與文化的歷史背景，並解釋李雙澤的文章裡提出的問題。雖然我講的也是中文，但是這種跨界的解說，而且是面向大陸更年輕的學生的嘗試，讓我覺得困難。除了要擔心我的講述方式他們可能聽不懂之外，更擔心我所解說的李雙澤的思想以及他動筆之後的實踐行動（開啓臺灣1970年代民歌運動），無法帶給他們任何興趣。可是沒想到，在我開放提問與下課後，有兩個學生發表了很深的感想，而且對我提出更進一步的問題。其中一位說：「李雙澤雖然談的是臺灣以前的狀況，可是看了他的文章，我也覺得現今的大陸沒有自己的歌。」而且同學也熱烈回應了我在課堂上佈置的練習思考題「『你的』歌／聲音從哪裡來」，以引導他們從敘述自己聽覺經驗的方式，作為與李雙澤的文章之回應與對話。其中一位同學一開始還告訴我，他寫不出來，但最後交了三頁感想。如何找尋以自己所學求生存的機會，也許是我接下來要一直面對的難題。可是帶著文化研究「應該嘗試創造一些新的文化、思想空間與知識連結的動力」的這一份心意(mind)，在臺灣之外意外嘗試的第一步，卻為我徬徨的心帶來鼓舞。因為我在學生思考的眼神與筆下的回應中，彷彿再度看見初遇文化研究的自己。我不知道我與「文化研究」在未來會走向何方，在上海一年多來的感受，讓我理解這裡的人文社會研究領域、民間的文化工作也一直在面臨新的困境與現實的挑戰，「文化研究」該怎麼走下去也是此地投身於此的研究者、參與者、組織者正在面臨的巨大難題。或許某些困境和難題是兩岸共有，也需要共同面對的，不過這個問題尚待有機會繼續描繪。